专　题

美国的亚洲战略

［美］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

内容提要：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是一种包含外交、经济、安全和民主等内容的综合性战略，其目的是维护美国未来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奥巴马并不寻求对抗中国，而是希望与中国建立建设性的、合作性的大国关系，但美国的亚洲战略已引起中国方面的新的猜疑。奥巴马的亚洲战略存在“走过头”的风险，美国并没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去全面实现奥巴马对亚洲国家的许诺，除非能有效解决国内财政和与之相关的政治问题，“收拾好美国自己的屋子”是这项亚洲新战略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关键词：奥巴马政府　美国亚洲战略　中美关系

2009年以来，奥巴马政府对于亚洲的总体政策姿态出现了显著进展。2011年11月，奥巴马总统在（夏威夷）火奴鲁鲁、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的一系列重要会见中，以最全面的方式呈现了这一结果，他清楚表明了一套融合了外交、军事和经济内容的战略，这一战略在从印度次大陆到东北亚的地区展开，并将深刻塑造美中关系。这一战略的核心讯息就是：未来数十年中，美国将在亚洲发挥领导作用。

很多美国媒体将这一讯息认为是仅以在亚洲对抗中国为目标，但实际上它较此更加复杂。奥巴马所提出的战略有多么现实主义，它会如何影响美中关系以及这两个国家在亚洲的作用？美国有资源实现关于这一历史性“转向”（pivot）的言辞吗？

［美］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

一、变化在何处?

奥巴马上台时公开称自己是“第一位太平洋总统”，他认为小布什政府对亚洲地区问题给予的关注太少，美国应恢复并进而提高传统上它在该地区的介入程度。这将包括三个主要方面：一是提升美中关系以使这一关系的范围和水平反映出中国已成为具有日益增长的全球联系的大国；二是加强与亚洲的传统友邦和盟国的关系；三是在发展和引导亚洲多边机制方面变得更加积极。从一开始，白宫就在这三个方面下功夫。当中国2010年间在东亚和东南亚的行为变得越发强势时，当美国在2011年大幅降低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活动时，奥巴马政府推进了在后两个方面的努力。特别是在2010年，美国日益介入回应中国在该地区的莽撞（heavy-headedness）。为回应朝鲜的核试验及后来针对韩国发动的极端挑衅，奥巴马政府明确地支持了首尔，向中国强力施压以使其约束平壤，并在中国的强烈反对下在黄海的国际水域举行了军事演习，以此作为对朝鲜的一种警告。

在东北亚和南中国海，奥巴马政府正式确认了它在涉及中国的领土争端问题上的中立立场，但采取了一些引发北京恼怒的实质性姿态。当日本在一起于钓鱼岛争端地区发生的事件后拘捕了酒醉的中国渔船船长时，美国国务院在回应媒体询问时明确表示，美日同盟关系适用于这一水域，因为这些岛屿处于日本的有效管辖控制之下。

南中国海地区数个沿岸国家围绕领土归属产生的争端再起，致使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在2010年河内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申明：美国在该地区的航行自由以及使该地区对正常的商业活动保持开放方面拥有重要利益。同时，希拉里表示，美国愿意推动以合作进程解决领土归属问题，她还称，美国认为所有海上领土主张都必须以对陆上自然构造的主张为支持。中国疑心华盛顿正插手这些领土问题并因此发怒，它明确表示，北京并没有看出该地区的航行自由受到了什么威胁。

通过这些以及其他事件，美国在2010年间对中国的若干举动做出了各不相同的反应，而中国的这些举动被美国的友邦和盟国认为是潜在地要利用中国的经济力量在该地区实现外交和安全上的收益。美国的反应则与非常积极的美中双边外交结合起来，从而使美中关系不致脱轨并设法应对了对彼此的期待。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2011年1月对美成功进行国事访问使美中双边关系保持在相当坚实的基础上。两国元首号召发展美中合作性伙伴关系。

奥巴马总统2011年11月间的亚洲之行则突出了美国政策中一直在推进的若干方面，并将它们通过某种方式一同呈现出来，该方式表明，这基本上是一种覆盖全地区的且综合了外交、经济和安全内容的战略。它包括以下四方面重要举措：

（一）多边组织。在过去数十年中，中国针对东盟（ASEAN）、10+3（东盟10国加中国、日本和韩国）以及东盟地区论坛（ARF）投入了大量努力。2005年左右，北京与东盟洽商了提供慷慨的“早期收获”措施的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在2010年生效。当然，该协定不包括美国。北京还支持将东盟地区论坛作为关键的地区安全论坛。

在这种背景下，通过积极支持两个不同的多边机制，奥巴马的决策在2011年11月转化为了成果。在经济和贸易方面，奥巴马称，美国希望正在谈判之中的“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能在2012年12月之前成为一个包括亚太地区主要经济体的高质量的贸易和投资平台。小布什政府先前在2008年倡导TPP，但它一直未成为具有很高优先性的工作。TPP正按照美国在透明度、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权利、环境保护等方面所倡导的原则来架构（它可被认为是“增强版的WTO”）。中国并不属于最先开始参与谈判建立TPP的那批国家。

在安全方面，美国正式加入了东亚峰会（EAS），奥巴马利用其首度参会的机会促使这一组织关注该地区困难的、具体的安全问题，特别是海上安全。这绝非北京所希望看到的，但2011年11月东亚峰会的大多数参与国支持美国的总体方针。

简言之，奥巴马正以行动改变亚洲的重要多边组织的重心，赋予那些美国参与其中的组织更大的重要性，并按照华盛顿支持的方针来领导这些组织。

奥巴马正以行动改变亚洲的重要多边组织的重心，赋予那些美国参与其中的组织更大的重要性，并按照华盛顿支持的方针来领导这些组织。

（二）经济和贸易。在执政后的两年半时间里，奥巴马政府在贸易问题上的表现令人失望。但在2011年10—11月间，它最终在华盛顿和首尔促成了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的批准，自此后，如前文所述，奥巴马政府将其关注点转移到将TPP发展成亚太地区的新的贸易和投资平台。这两项工作使亚洲一时间成了美国经济和贸易倡议的重心，这符合奥巴马经常重复的表态，即对于美国未来的经济繁荣来说，没有其他地区像亚洲这样关键。这一切的到来伴随着在经济和贸易方面与中国之间紧张关系的上升，在由华盛顿的选举政治和北京的权力交接政治所构成的未来一年中，这种紧张关系不可能缓和下来。

（三）安全。在2011年11月的亚洲之行中，奥巴马毫不含糊地表示，他将保证美国在亚洲安全方面的投入不会受到美国防务开支在未来的任何削减的影响。特别是，他在澳大利亚签署了允许25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在达尔文轮换驻扎的协议。在国防部长帕内塔于数周前访问这一地区之后，奥巴马明确表示，他想要美国的军事和更广意义上的安全关注点从伊拉克和阿富汗转移到亚洲，而且这一新的军事态势不会受到任何未来的防务开支削减的影响。

在2011年11月亚洲之行后，奥巴马政府于2012年1月发布了军事预算受限时期的美国未来防务战略，该战略阐述了新的联合作战介入理念（Joint

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这些文件进一步使美国军队致力于维持其应对其他任何国家拒止或限制美国军事力量在该国领海之外地区的行动自由的能力。此外，这些文件强调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力量将变得更加灵活，但在能力上不会因为未来的任何防务开支限制而下降。

（四）民主。全球民主议程在奥巴马任期内一直不是一个显著内容，但这随着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运动而发生了很大变化，该运动使奥巴马政府提升了对阿拉伯国家内部的民主运动的支持。2011年底在缅甸出现的出人意料的进展则使奥巴马政府对亚洲的民主改革给予更加明确的支持。结果，奥巴马在其2011年11月的亚洲之行中清楚表示美国将促进亚洲的民主和人权。在此行的最后一站，奥巴马宣布希拉里·克林顿将在当年12月初访问缅甸以感受那里新的改革生机并鼓励其朝向更民主的治理迈进。在克林顿访问缅甸之后，美国已逐渐与缅甸政府进行交往以促进该国的民主改革。总之，如今，美国新的地区战略比以往包含了更突出的“民主”成分。

奥巴马以一种战略层面的综合性方式将没有联系起来的各部分汇合在一起，明确重申和承诺要在可预见的未来维持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

奥巴马在其11月亚洲之行中所公布的具体举措，大部分都在2010年或之前的时间里有其前奏。比如，TPP的构想始于2008年，关于将一些美国部队重新部署在亚洲和在澳大利亚进行轮换部署的各种计划可追溯到差不多10年之前。在2011年11月变得清楚的是，奥巴马以一种战略层面的综合性方式将没有联系起来的各部分汇合在一起，明确重申和承诺要在可预见的未来维持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

二、中国的认知

不过，令人吃惊的是，中国对这些新的进展感到担忧。它们在很多方面加剧了中国对美国的持久猜疑。在中国人看来，美国总是最关心如何保护其全球主导地位，这就必然意味着美国会尽其所能地妨碍或扰乱中国的崛起。美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失了方寸（lost its stride）且复苏疲弱，而中国则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种情况不过是加深了北京对华盛顿决意推迟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强大国家的担心。

例如，北京显然在下列方面发现美国的所作所为从根本上具有敌对性：吹捧中国国内的持异见人士以给中国制造不稳定，继而通过网络活动将这种不稳定夸大为可推翻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动荡；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向中国施压从而加剧中国国内具有不稳定性影响的失业问题，并将美国民众的注意力从美国自身的失败上转移；通过煽动中国领国对北京意图的忧惧，以及鼓动像越南（从传统上就对中国的意图抱有深深的猜疑）这样的国家来为北京制造难题；促进亚洲国家（特别是主要的民主国家）之间的合作以阻碍中国实现在该地区作为大国的正当角

色；挑战作为失去光彩的西方民主模式替代方案的中国发展模式；利用建立 TPP 这样的措施来缩小人民币国际化的范围，中国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是约束美国滥用美元全球储备货币角色的重要步骤。总之，奥巴马的亚洲整体战略，以及与之相随的若干言辞直接造成了很多中国人的一种认知，即美国的所有行动是阻碍或实际上扰乱中国崛起的阴谋。

中国的领导人非常务实主义并对美国的实力和能力抱有足够的重视，对于北京来说，奥巴马关于美国在亚洲持续发挥领导作用（为美国的全面战略思维和有效外交的充分例证所支持）的自信宣示，已经提出了一个不受欢迎的可能性，即中国自身的地区战略会面临一个相当新的大环境。

三、将会发生什么?

很多美国媒体将2011年11月奥巴马的亚洲之行描绘成对美国亚洲领导地位的确认，认为美国已有效地在各个方面挑战了中国。美国的倡议似乎在东亚峰会上受到几乎所有主要国家的热情而明确的支持，这一情况强化了美国媒体的上述认知。但从奥巴马想要做什么以及最终得到的结果这两方面来说，实际情况要更加复杂。

（一）更复杂的美国战略

奥巴马政府总体上并不寻求对抗中国。相反，它希望与中国发展一种建设性的，本质上是合作性的大国关系。它通过一种包含两层面内容的方式寻求增大实现上述那种大国关系的机会：一是重新确认和加强与中国的合作性关系；二是在亚洲建立强有力的和可信的美国存在。由此，奥巴马政府正继续集中力量发展美中两国关键的高层领导人之间的密切的个人联系。奥巴马与胡锦涛主席已有10次会面，与温家宝总理也多次会晤。希拉里国务卿格外努力地与戴秉国国务委员保持接触，定期与其举行持续数小时的非正式会谈。财长盖特纳也与王岐山副总理保持着非常密切的沟通。

奥巴马政府总体上并不寻求对抗中国。相反，它希望与中国发展一种建设性的，本质上是合作性的大国关系。

应在这一背景下看待习近平副主席2012年2月对美国的访问。习副主席与奥巴马总统举行了90分钟的私人会谈，对于一个国家的副主席来说，这种安排显然是史无前例的。他还与国务卿、国防部长、国会领袖以及其他美国高层人士会面。这一安排的重要目的在于，培育一种个人层面的相互了解和安心，这对在未来数年中最大程度地降低不信任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这些私人会面的气氛一直是：非常充分地阐释和讨论各自的立场，带着一种相互妥协的精神来深化了解、增加互信。这种双边外交中静悄悄的一面是在寻求减少不必要的中美之间的敌

意，并且为在全年陆续展开的中美政府间60多个定期会谈机制设定基调和议程。

（二）中国的回应

中国的确对2011年11月奥巴马亚洲之行的范围和各种细节感到诧异，但中国的初步反应却是温和的。胡锦涛等中国领导人希望避免短期内对中美关系的任何严重损害，很可能是不希望在非常敏感的政治之年引发内部对中美关系的重大重审。然而，中国领导人必须对流散的民族主义情绪有所考量。这种情绪会增大对领导层的压力，以反击美国在中国后院伸张其领导角色的做法，并且让美国人认识到亚洲地区处于改变之中的权力平衡。可能出现的情况包括，总体上紧张关系的升级；在对伊朗实施制裁和与最高权力更替中的朝鲜打交道方面减少合作；在中国经济专属区内的突发事件会增加，仅举数例。这些可能性都不能被排除。每一种可能情况都会导致中美关系中摩擦和不信任的升级。军方在中国政治中的作用是非常不清楚的，但会影响这些反应。中国的权力交接会使局势朝着哪个方向发展，这取决于内部的动势（dynamics）。如果要防止局势朝着更糟糕的方向转变，就需要美国做出积极的、持续的、仔细斟酌的外交努力。

（三）内部的管理层变动

奥巴马政府内部正出现重要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可能会具有相当的影响。奥巴马政府中国政策的制定从一开始就是基于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James B. Steinberg）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贝德（Jeffrey Bader）之间的密切合作。他们是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最先处理中国事务的两位高层官员，他们进行了非常有效的合作以保证白宫在中国政策以及相关的更宽泛的亚洲政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自2009年年底开始，国务院出现了一种寻求对华采取更强硬立场的不同思路，这种思路还主张要提醒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小心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并联合起来限制中国的行动。

自2009年年底开始，国务院出现了一种寻求对华采取更强硬立场的不同思路，这种思路还主张要提醒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小心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并联合起来限制中国的行动。在国防部也有这种想法，认为人民解放军在中国的对外政策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而这些政策不利于美国在亚洲的境况。上述两种政策思路并非完全冲突，但每一种思路都有意识地寻求塑造美国的总体政策，经常在各种问题出现时导致不同的战术性建议。

在国防部，还有另外一种因素在发挥作用。着眼于未来受到重大预算限制的可能性，五角大楼的各部门都在研拟依据和理论以为其未来的资金筹集寻求支持。这会增强他们强调中国快速的军事发展所构成的潜在威胁的倾向，而这是这场预算之战的固有组成部分，从2012年年初开始，已有证据显示这种情况正在发生。中国军费持续以两位数增长，加之

人民解放军相对缺乏透明性，这使上述观点在华盛顿具有了更大的可信性。

斯坦伯格和贝德先生在2011年春离开了政府，在他们走后，在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或五角大楼部门首长的层面或更高层面，已没有中国问题专家。如果说这种人事上的变化会带来白宫政策的实质性变化的话，那么在新的问题出现时，就会证明这将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新情况。

在他的亚洲之行中，奥巴马总统从来没有讲“转向”这个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讲的是“再平衡”而非“转向”。相反，希拉里国务卿反复把美国的政策说成是“转向亚洲”，这种情况暗示有些非常新的不寻常之事正在发生。

在一段时期以来，中国的高层官员已经认识到上述美国政府中的这些分歧，并且相应地对那些显示更强硬路线胜出的迹象做出了反应。

（四）美国的可信度

如前所述，中国的领导人是非常务实的。如果北京方面确信美国仍具备长期领导亚洲的能力并且华盛顿欢迎中国的崛起（只要北京不挑战美国在该地区的总体地位或关键利益的话），北京会以提升着眼未来的建设性伙伴关系潜力的方式进行很好的适应。如果美国采取一种连贯清晰的亚洲战略且这一战略在该地区受到广泛尊重并被认为是可信的话，北京不太可能与美国“较量”。

总体看，言辞和外交能够塑造认知和期待，因此它们是外交政策成果的重要决定因素。但从长期看，可信性也很重要，可信性意味着明确拥有在长时期内实施总体战略的资源和能力。在当前的背景下，美国的地位面临若干严重挑战。毕竟，亚洲民众总体上将这场全球金融危机视为“美国制造”，认为美国的民主体制近年来运转失利，相信美国军队不可能拥有必要的全部资源来维持那种华盛顿所希望的在广阔的太平洋地区的部署。的确，亚洲的最大疑问是美国是否会从当前的财政危机中恢复过来并很快走上一条财政健康并具未来力量的道路。2011年8月，在提高债务上限问题上出现的政治失能给美国在亚洲的声誉带来极大的损害，因为它在美国能否走出财政危机这一问题上释放了如此强烈的负面讯号。

美国的地位面临若干严重挑战。亚洲的最大疑问是美国是否会从当前的财政危机中恢复过来并很快走上一条财政健康并具未来力量的道路。

因此，奥巴马在2011年11月亚洲之行中所发表的言辞有一些一相情愿。奥巴马指出，如果能接受TPP所包含的高标准，所有国家都会被欢迎参与共创亚洲的繁荣，而事实是，当前该地区所有主要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是中国而非美国，而且中国并没有按照上述标准来行事。没有哪个亚洲国家表现出愿意做损害其与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之间的联系的任何事情，特别是在当前美国经济增长疲弱而欧洲又处于非常不确定的经济前景的情况下。此外，美国的军队正面临未来10余年内整体预算将被削减超过1万亿美元的处境。大多数亚洲国家的政府都想知道这是否将对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实力以及美国运用军事力量的意愿造成不利影

响。当前仍远远落后于美国军队的中国军队，似乎在未来数年中仍会享有每年两位数的预算增加。

总之，影响美国未来在亚洲地位的极其重要的因素是，美国能在多大程度上修复自身国内经济，并且像在其历史中经常出现的那样，展现出美国的制度可以从严重的国内问题中恢复过来并因这场危机迫使美国做出的改变而比以往更加强大有力。

（五）中国的未来发展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自身的发展前景。在讨论中国的国际角色时有一种感觉是，中国的增长动力是不会停止的，中国的制度在国内是非常稳固的。但是这些看法实际上都有问题。北京已经明确表示，它必须改变其发展模式，因为这一在过去几十年中被证明是如此成功的模式已经走完了自己的路，并日益产生在经济上不可持续、在社会方面引发不稳定的结果——财富的高度不均、问题产品和食品安全问题、恶化的腐败状况、灾难性的环境退化、降低的投资回报率，对于制度本身已变得不公正的普遍感受，等等。但没有什么证据让人相信北京会在权力交接时期做出解决上述问题所需要的极为困难的政治决断，这些决断将挑战商业界以及一些有权力的地方领导人的既得利益。

实际上，权力交接这一问题有理由使人对2014年之前中国进行重大的国内改革不抱乐观态度。然而，如果缺乏对政治体制做出艰困的变革，中国的政治稳定并不能得以保障。如果中国出现了重大的政治不稳定，或是其发展动力遭遇突然中断，亚太地区的认知会发生改变，从而很容易影响对中国在该地区的角色以及中美在该地区力量对比的看法。

四、这一步走的太远?

美国并没有资源和能力去全面实现总统的许诺，除非美国较前远为有效地解决国内的财政和与之相关的政治问题。“收拾好美国自己的屋子”是这项亚洲新战略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很明显，美国在去年11月关于向亚洲进行战略再平衡的宣示，是想要使该地区对美国未来在亚洲的领导角色产生信心，对华盛顿施行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外交杰作（tour de force）的能力产生尊重。亚洲的很多人一直在担心美国的衰落。奥巴马则表达了美国的乐观精神、原则、决心和领导力。这项战略有大量的潜在好处，但它并不一定是像奥巴马总统和希拉里国务卿所认为的那般嘹亮的号角。最重要的是，美国并没有资源和能力去全面实现总统的许诺，除非美国较前远为有效地解决国内的财政和与之相关的政治问题。“收拾好美国自己的屋子”是这项亚洲新战略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而且，中国可能会以更具挑战性的方式做出回应，

尤其是在受到国内政治影响的情况下。

此外，亚洲的大多数国家决心继续拓展它们与中国的经济和贸易联系，即便它们担心北京会利用其不断增长的经济力量来获取外交和安全方面的优势。因此，这些国家想要美国防止中国在该地区成功利用针对他国的优势，同时，没有国家想要看到充满紧张的美中关系，这种关系会对他国造成选边站的压力。实际上，它们想要与中国和美国都保持差不多的有效关系并且从两个大国在该地区的合作与竞争中获取好处。美国的大多数领导人都知道这一微妙的事实，但需要实现一种微妙的平衡，而保持这种平衡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直到2011年，美国一直主要采取外交和安全上的行动来回应其亚洲盟国和友邦的请求。这样做会带来直接的风险，因为像越南和菲律宾这样的国家可能会成功地将美国拖入它们与中国之间的领土争端，这是华盛顿在过去一直明智地小心翼翼予以避免的情势。更要紧的是，这种做法会带来长期性风险，即亚洲会日渐成为美国的成本中心（提供安全是昂贵的），同时却继续成为中国不断发展的获利中心（因其广泛的经济交往）。考虑到美国的财政困境，这并不是一个令人安慰的、甚至可能是不可持续的政策路径。

奥巴马政府针对亚洲的再平衡预计会确立一种涵盖经济、外交和安全内容的更宽泛方针。近期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得到批准以及发展TPP的努力是沿着这一方向的非常重要的步骤。但是这一新的综合的亚洲战略存在着走过头（overreach）的风险，会造成华盛顿没有能力满足的期望，并深化中国的疑虑，从而导致出现一种更易陷入波折的美中关系。

这一新的综合的亚洲战略存在着走过头的风险，会造成华盛顿没有能力满足的期望，并深化中国的疑虑，从而导致出现一种更易陷入波折的美中关系。

因此，对于美国官员来说，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猜疑和紧张关系，注意控制自己的言辞非常重要，这些言辞会充实美国战略的细节。因为2012年选举和权力交接分别会在两国展开，美中关系的大的进展是不可能出现的。此外，美国不应该忽视提升与北京关系的重要性，这是任何成功的地区和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在亚洲其他国家的成功本身并不会产生奥巴马所寻求的那种地区局面。

总之，奥巴马政府已通过积极的地区外交，对将TPP发展成多边贸易和投资平台的强烈支持，以及承诺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不受未来预算削减的影响，为其亚洲再平衡战略提供了支撑。中国已经清楚地注意到这些，但这种情况将导致更具有建设性的交往，还是会使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更具对抗性仍不清楚。奥巴马想要的是前一种情形，但还远未能确保这种情形会出现。

如果能成功的话，奥巴马在亚洲的这些举措的综合体能够为奥巴马未来在世界各地的更广泛的一系列地区战略提供一种基本模板，这些举措包括机敏的地区外交、与崛起的中国建立联系并予以制衡、积极推动重大的地区经济和贸易倡

议、改革美国的防务态势使其更加灵活。

成功的关键在于美国能否有效地解决其长期性的财政问题。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所有国家，都在寻找美国再兴抑或即将衰落的征兆。如果美国像它在历史上多次所做的那样，显示出能够实现必要的变革以解决国内的危机并让自己因这些变革而比之前更具活力，那么，在贯彻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战略以及在其他地区的相应战略时，美国就会处在有利位置。如果看起来更可能是衰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就会逐渐削弱成功的亚洲战略和其他地区战略所需要的那种活力。

（凌岳　译；李潇潇　校）